



怀念车向忱老师

# 怀念车向忱老师

——一个东北流亡孩子的回忆

陈 静 波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陈静波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。作者以崇敬的心情，记述了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车向忱同志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于西安古城艰苦创办“东北竞存学校”，辛勤哺育青少年的革命事迹。车向忱同志历尽千辛万苦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把成百成千的东北流亡孩子，组织到学校里来，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人材。全书语言朴实流畅，事迹真实感人，是一部很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读物。可供广大少年儿童阅读。

### 怀念车向忱老师 一个东北流亡孩子的回忆

陈静波

\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737×1002毫米32开本 2,375印张 47,000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R10091·914 定价：0.23元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.....	( 1 )
1 没有钱,也不能叫孩子们失学.....	( 2 )
2 记住,打回老家去!.....	( 5 )
3 读书为了救国,救国必须抗日 .....	( 8 )
4 要做真正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.....	( 10 )
5 还我校长,还我老师.....	( 17 )
6 不是好老师,把他轰出去.....	( 24 )
7 城里不让抗日,到乡下去.....	( 33 )
8 问问他们,东北学生是不是中国人.....	( 41 )
9 他是坏蛋,把他撵下台去.....	( 45 )
10 孩子!我只剩下三块钱了.....	( 50 )
11 投八路去,我赞成.....	( 54 )
12 毛主席接见了我 .....	( 60 )
13 我是共产主义战士了 .....	( 65 )

## 写在前面

我的民族、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，我走上革命正道的指路人车向忱同志，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和他们的死党残酷迫害致死，现在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。在粉碎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欢乐声中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，在这深切怀念先烈们的思绪中，作为幸存者的我，应该怎样地活着，怎样踏着先烈的足迹，去走完他所未走完的革命路程呢？我常常想起那些已故去的老战友、老同志，那些难忘的良师益友。在这些人中，车老师是我最为怀念的一位。在那抗日战争的年代，车老师艰苦创办“东北竞存学校”，辛勤哺育青少年的革命事迹，历历在目，犹如昨日。让我们静静地回到四十多年前那峥嵘艰苦的岁月吧！

陈静波

## 一、没有钱，也不能叫孩子们失学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中国共产党，促成了“西安事变”的和平解决，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的希望，二十几万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们，无不兴高采烈，磨拳擦掌。他们结成了抗日联军，枕戈以待，急切地盼望着“何日奉命提队旅，一战恢复旧山河”。

可是，背信弃义的蒋介石，扣压了亲自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，并逼迫杨虎城将军辞职出洋。充满着团结抗日气氛的古城西安，顿时又出现了浓云密布、万籁俱寂的恐怖局面。东北军被逼散了，七零八落，溃不成旅。流亡了六年的东北同胞，又回到了“一党专政”的魔爪之下。千千万万的东北青少年，又面临着无依无靠、流落街头的悲惨绝境。

当时，我是一个十三岁的东北流亡孩子。西安事变前，我曾在专门为东北流亡儿童开办的东望小学读书。一九三七年二月初，国民党中央军开进了西安，张、杨两将军的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大布告，从钟楼上被拿掉了；“团结抗日，一致对外”的大标语不见了；免费上学的东望小学停办了。我们这些流浪的青少年去哪里念书？去官办的学校吗？学杂费、书籍费、制服费……缴纳不起；去当童工吗？年龄小，没有人要。真是生活无着落，上学无门路。衣食在哪里？课堂在哪里？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在哪里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陷入怅惘、失望之中。

现在，回忆不起来，当时是哪一位老前辈告诉我：

“去找东北‘甘地’——车向忱老先生去！”

“去吧！孩子，你要念书找他去。”

我心神不定的自问着：东北“甘地”是什么人？车老先生又是什么人？他怎么能够不叫我们失学呢？

这位老前辈向我介绍了车老先生如何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于沈阳创办平民学校；如何独自跨越兴安岭，联络东北义勇军，进行敌后抗日活动；又如何用两块钱在西安创办起一所“东北竞存小学”，为教育东北流亡儿童，他想方设法，费尽心机；现在，又把学校从东关索罗巷迁到大南门里韩湘子庙内。

真有这样的好老师吗？真有这样不收费的学校吗？我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，沿着南院门和湘子庙街，走进了这所学校。一跨进挂着“东北竞存小学”校牌的庙门，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堂役（即工友）刘大爷，把我引进了校长室。这是由一间配殿隔起来的不到十平方米的破旧砖屋，既是办公室，也是宿舍。我轻轻地跨进门檻，双眼向屋内张望，看见一张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穿旧灰布大褂，两脚穿着东北军士兵常穿的旧“傻鞋”，中下等个，身材瘦削，但很结实的人。

“校长，又一个报名上学的孩子。”刘大爷引见了我。我深深地向校长鞠了一躬，说了一声：

“校长，您好！”

车老师站起身来，我抬头一看，老师的面色黄白，眼边刻上了深深的角纹，光着头，年纪四十左右岁。可是，为什么大家都叫他“东北甘地”呢？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因为他为了抗日救国，日夜奔走，为了青少年的教育吃尽千辛万苦。

他那反帝爱国，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和印度的民族运动领袖、被印度人民尊称为“圣雄”的“甘地”相似，所以，人们才这样赞誉他。

车老师问了我的姓名、家庭情况，然后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跟我来念书。”

他把我领进教导处，登了记，编了班。

“买课本的钱带来了吗？”教导处的老师问我。我摸摸口袋，剩下的几个铜板已经吃了早饭，一个子儿也没有了。我的脸热辣辣的，心直跳，一声不吭，怕的是又象以前几次到官办的学校报名那样，都是因为没钱，被撵了出去。

“说话呀！孩子，不要紧，没有钱也念书，不能失学。”



车老师很体谅我，同时，又对教导处的老师说：

“把书先给他，他交不上书钱，就在我的薪水（即工资）里扣除。”

我的窘境解除了，双手捧着崭新的课本，深深地向车老师鞠了一躬。

车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了高小二班的教室，把我交给了级任刘明老师。刘明老师很年轻，很关心同学们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以竞存学校为基地，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的中共地下党员。在车老师的掩护下，他为宣传抗日救国，培养学生们的思想做了许多工作。一九四四年，我们在延安中央党校见了面，抗日胜利后，一同来到东北。一九四五年冬，刘明同志在辽宁法库壮烈牺牲。他也是我深切怀念的一位好老师，好同志。

从此，我又重新开始在高小二年级读书。因为到处流浪，我耽误了学业，念了七年书，高小还没有毕业。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。

## 二、记住，打回老家去！

东北竞存小学开学了。我们的开学典礼就在湘子庙的大殿里举行。我们唱的歌子，不是国民党规定的“吾党所宗……”，而是按照车老师提倡的，刘明老师教我们的“五月的鲜花”。

“五月的鲜花，开遍了原野，鲜花掩盖着志士们的鲜血，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息。……”

老校长讲话了：“同学们，别看咱们校舍是座破庙，咱们要学得好；别看咱们穷，要有志气……”又说：“咱们的校名‘竞存’，就是要竞争才能生存，以竞争求生存。那么，我们和谁争呢？要和日本鬼子争，要和不让抗日的反动派争，要和卖国求荣的汉奸争。只有和他们争，和他们斗，我们才能生存，才能打回老家去！我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已整整六年了，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们正在遭受着日寇法西斯的蹂躏践踏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车老师的眼圈红了，哽咽住了。我站在前面，清楚地看见他的两眼充满了热泪。同学们小声抽泣，有的哭出声来。车老师用他那习惯颤抖的右手（这是他为联络东北义勇军爬山越岭时，挨饿受冻，留下的残疾），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布包，接着说：

“老师们，同学们，你们看，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家乡糟蹋成什么样子？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是怎样受压迫、被屠杀……”车老师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他潜回东北时搜集的日寇烧杀奸淫，欺压蹂躏东北人民的照片，对东北儿童进行奴化教育的课本，为进行经济掠夺而发行的伪币等等，一件件展示给大家。这是一堂非常生动、深刻的反对侵略，热爱祖国的教育。

刘明老师指挥我们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：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

“打回老家去！打走日本帝国主义！东北地方是我们的！他杀死我们同胞，他强占我们土地……”开学典礼成了抗日救亡的誓师大会。

“开始上课了，我们一边学习文化知识，一边学习抗日救

亡的道理。车校长、刘明老师还和我们一起用了将近一个学期的美术课时间，制做了一个两米见方的东北地理模型。松辽平原、长白山、兴安岭、黑龙江、松花江、铁路、矿山、城市等，都在这块大沙盘上刻画得清清楚楚。尤其是长白山麓、松花江边还标明了东北义勇军活动的区域，以及一些歼灭日寇战役的地点。

车老师对大家说：“记住，打回老家去！”于是，同学们就把这个大沙盘命名为“记住，打回老家去！”车老师还用我们制做的这个“记住，打回老家去！”的模型，向全校同学进行抗日救亡教育。这是多么生动的爱国教育，多么有力的抗日救亡教育课啊！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一切还深深地铭刻在我



的心中。

### 三、读书为了救国，救国必须抗日

一九三七年上半年，我是在抗日救亡的教育中，在勤奋的文化学习中度过的。

高小毕业了，该上初中了。可是，上哪个中学呢？去国民党官办的中学，能交得起学费吗？要是不上初中，那怎么办呢？学期末，毕业考试未完，同学中间就不安地议论起来。少数家境稍好一点的同学，准备去考官办中学。可是，我们许多穷孩子生活无依靠，升学无着落，做工无门路，心中又似乌云一般翻腾起来。

有的老师关心地说：“等着车校长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办中学班。”还有的老师对我们说：“车校长为了不叫高小毕业的一百多名同学失学，早就出去‘化缘’了。”

“化缘”就是募捐，这是我们学校当时经费的主要来源（后来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每月给学校秘密补助300元）。向谁募化呢？找东北军的军官，找同情东北青少年的爱国人士，找社会上热心教育的知名贤达。我们的车老师一年中总有半年的时间在外面奔波。为了教师的生活，为了这些流亡孩子们能够读书，一句话，为了生存，他跑遍了南方、北方，跨过了黄河、长江，时而走进知名人士的公馆，时而出现在东北军或西北军部队的营房。他能步行，绝不坐车，就是乘坐火车，也只买三等车票，找不到座位就蹲在过道上。肚子饿了，买个馍馍泡开水充饥，从不进饭馆。夜晚，宿在几角钱

住一宿的小店里。夏天，有时还在人家的门洞里过夜。可是，他背上的搭包里，却常常装着成百、上千募捐来的经费，而自己绝不多花一分钱。

七月的西安，好象“老天爷”降火一样的炎热。就在这老师和同学们急切地等待车校长回来的日子里，北平城外，芦沟桥上，二十九路军的将士用大刀砍掉了成百成千个日本侵略者的头颅，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。这个消息震撼了整个西安；湘子庙内这群流亡孩子们的心，就象开了锅似的，立刻沸腾起来！

“上前线去，打鬼子去！”

“打回老家去的时候到了！”

“不念书了，投笔从戎！”

竞存学校几百名师生渴望杀敌的心，比七月的骄阳还要炽热。

恰在这师生们抗日杀敌的呼声十分高涨的时候，我们的车老师从外地“化缘”回来了。他一进校门就兴奋地说：

“同学们！我们有了办中学的经费了，大家可以继续念书了！”

“校长、老师，我们不想念书了。上前线去，打鬼子去！”这是我们许多同学的呼声。

“我问你们，日本鬼子打进了华北，占领了平津，要灭亡整个中国，可是，政府当局下决心抗日了吗？中央军上前线了吗？你们上哪个前线？你们跟谁去抗战呀？”这一系列问题，把我们这些被抗日热情冲动着的青少年问住了。

“同学们！我们要时刻准备上前线，可是，不能盲目行



東北競賽

动，要看准方向，要走真正抗日的正路。”

接着，车老师又说：

“为了抗日救国，打回老家去，现在，我们就要努力学习，锻炼自己，武装自己。”

我们真的这样做了。学校成立初中班，除了讲授必要的文化课外，还开设了抗日救亡理论课、游击战术课、军事演习课等。在教导处公布的初中一年级课程表中，车老师亲自讲授抗日救亡理论课，从八路军办事处请来了一位同志担任游击战术课，并领导我们进行军事演习。此外，还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小组。这种抗日教育，在西安许多学校中是独树一帜的。

“同学们，老师们，我们读书为了救国，救国必须抗日，抗日必须坚决！”这是车老师反复强调的。现在，我们有了车老师“化缘”来的经费，又有了抗日救亡的教育计划，大家都有了信心，有了奔头，有了希望。于是，中学部的同学增多了，整个大湘子庙的两层大殿和周围的配殿，共计二十多间小砖房，被二百多名同学挤得满满腾腾。小学部的二百多名同学，只好全部迁到小湘子庙，而且，比我们还要拥挤。我们高高兴兴的在大湘子庙门口，挂上了“东北竞存中学”的校牌。一所培养抗日救亡人材，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西安古城诞生了。

#### 四、要做真正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

一九三七年八月，正是暑假期间，车校长和十几位老师

正为九月份中学开课，辛苦地准备着。这时，三位陌生的青年人住到了小学部的教室里。他们深居简出，终日看书。他们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在这里住着？我和几个好奇的同学常常到他们的屋外转转，并不断向屋里张望；他们也渐渐地注意了我们。有一次，他们和蔼地说：

“进来吧！小同学，不要怕，我们也是学生。”

于是，我和几个同学就壮着胆子进去了。经过攀谈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从西北战地来的，在这里暂住，还要去别处参加抗战（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通过车老师的帮助，准备去延安，进抗日军政大学的）。

“你们住在这里，车校长同意吗？”我们好奇地问。

“校长不同意，我们敢在这里住吗？”

“就是车校长把我们安排在这样的。”他们三人一齐向我们回答。

他们有一个书箱子，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，我冒昧地问他们：

“你们看什么书？可以给我们讲讲吗？”

他们很爽快地从书箱中拿出苏联高尔基的《母亲》，富尔曼诺夫的《夏伯阳》和绥拉莫维支的《铁流》等长篇小说。我们看了，非常高兴。可是，第一次和这样“来历不明”的人接触，心里还有些不踏实。于是，我就去问车老师。

“他们是好人，是坚决抗日的！是真革命的！那个好说话的叫王强，是东北人。你们多和他们接触接触吧！”车老师深切地嘱咐我们。

这样，我们几个同学就放心大胆地去找他们，并且和王强

接触最多。那些苏联小说，我们看了一本又一本，不懂的就问，不认的字就让他们教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教我们唱苏联歌曲，如“祖国进行曲”、“囚徒歌”等等。他们三人中不记得是哪一位，开始向我们谈起了毛泽东、朱德，红军、共产党以及苏区，还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等一些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。这些事迹强烈地吸引了我们这几个一心抗日救亡的少年。

十几天过去了。一天，王强问我：

“你知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吗？”

“西安事变”之后，我就听说有这样一个进步组织，还听说西安二中就有民族解放先锋队（简称“民先”）的队员，但是，认不准谁是。今天，听他这么一问，引起我想要参加这个组织的强烈愿望。我接着他的问话，谈了很长时间。

在王强同志的启发、帮助下，就在八月间，由我和另两名同学为发起人，建立了东北竞存中学“民先”小组。

一天晚上，车老师悄悄地把我找到他的房子，问道：

“你参加‘民先’队了？”

这一问把我窘住了。因为“民先”的组织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还处在秘密状态，我不知如何回答。还没等我答话，车老师便诚恳地说：

“不用瞒我，王强他们和我说过了。你们做的对，要抗日，就要组织起来，还要联合外校同学，要做好工作。”

“老师，你也是‘民先’队吗？”我幼稚地发问，车老师笑了。

“‘民先’队是进步青年的组织，我是老头了，不能参加了。但是，我支持你们。你们可以在校内放心大胆地活动，